

蒙古文《西游记》研究

巴雅尔图 著



方志出版社



蒙古文《西游记》研究

ISBN 978-7-80238-430-9



9 787802 384309 >


ISBN 978-7-80238-430-9/K·200

定价：38.00元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

蒙古文《西游记》研究

巴雅尔图 著

 方志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蒙古文《西游记》研究/巴雅尔图著.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 - 7 - 80238 - 430 - 9

I. 蒙… II. 巴… III. 西游记—文学研究 IV. I207.4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8493 号

蒙古文《西游记》研究

著 者: 巴雅尔图

责任编辑: 李 沛

出 版 者: 方志出版社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5 号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大楼 12 层)

邮 编 100732

网 址: <http://www.fzph.org>

发 行: 方志出版社发行部

(010) 85195814 85196281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二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2 千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80238 - 430 - 9/K · 200

定价: 3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阿日那与《西游记》	(15)
第一节 阿日那家世及其主要经历	(15)
第二节 阿日那蒙译《西游记》	(20)
第二章 蒙文《西游记》研究史话	(41)
第一节 从《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到《西游记》 杂剧、《西游记》和蒙文《西游记》	(41)
第二节 18世纪蒙古学者的《西游记》研究	(48)
第三章 卫拉特、鄂尔多斯蒙古文《西游记》	(56)
第一节 卫拉特蒙古《西游记》故事	(56)
第二节 贺希格巴图与《唐僧喇嘛传概要》	(65)
第四章 蒙文《西游记》三种抄本述略	(75)
第一节 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述略	(75)
第二节 库伦旗抄本蒙文《西游记》述略	(83)
第三节 喀尔喀抄本蒙文《西游记》述略	(85)
第五章 阿日那蒙文《西游记》回后批语比较研究	(98)
第一节 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回后批语概述	(98)

第二节 蒙文《西游记》回后批语辨析	(100)
第六章 《西游记》与蒙古古典文学	(136)
第一节 蒙文《唐僧取经故事》的历史印迹	(136)
第二节 蒙古文学与《西游记》	(139)
主要参考书目	(148)
附录一 蒙文《唐僧取经故事》、《西游记》40种抄本列表	(152)
附录二 蒙文《西游记》回后批语	(159)
后 记	(176)

序 言

蒙古族是亚洲最古老而文明程度很高的民族，向来以勤劳、勇敢、豪爽、能歌善舞、极富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才华著称于世。远在 13 世纪，蒙古族统一北方民族，征服西亚和欧洲，入主中原建立大元帝国，促进了世界多元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交流与互相影响，大大缩短了东西方文明发展的差距。不仅如此，蒙古族也像其他创造过辉煌历史的兄弟民族一样，在进取中不断反省历史经验教训，在 14 世纪 60 年代末至 18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大变革中，特别是在蒙、藏、满、汉民族历史、宗教、文学交流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果说著名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包括长篇神话小说《格斯尔》）以及伟大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公元 1240 年左右）是反映蒙古族古代社会文化发展状况的三幅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那么，18 世纪初问世的著名翻译作品蒙文《西游记》（1721 年），可谓是通过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来折射社会现实，表达民族意志和理想，进而推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发展进程的光辉写照。

众所周知，14 至 16 世纪末是我国各民族文学艺术事业长足发展的时代。此间形成的民族文艺复兴浪潮席卷祖国大地，首先推动汉民族古代文学的飞速发展，为汉文章回小说的崛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继元明之际出现的两部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如 1522 年刊行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如《贯华堂水浒传》，1661 年）之后，鸿篇巨制神话小说《西游记》（1592 年）问世，以其独特的文学形式和深奥的思想内容，生动地反映了 16 世纪后半期掀起的浪漫主义新文学思潮的精神主旨。而元代杂剧和明清小说的繁荣发展，无疑对蒙古族古典文学产生巨大影响，促使蒙古族历史悠久的英雄史诗创作趋向历史化，为传统书面叙事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社会文化基础。于是，历史悠久的蒙古族短篇小说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趋势，产生了一批具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新作品。14世纪的蒙古文《苏勒哈日乃传》（即新疆吐鲁番出土的《亚历山大传》）、《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传》；16世纪的《乌巴什洪台吉传》、《胡巴·那噶巴日勒传》；17世纪的《恩都日勒可汗传》（1662年）；18世纪的《额仁赛音·额日赫勒岱·莫日根》、《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1716年）等多部古典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广泛流传，就是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蒙古族古典文学与印度、西藏文学和汉民族古典文学互相影响乃至平行发展的例证。可以认为，18世纪初也是蒙、汉民族古典文学和蒙、藏民族古典文学交流最密切，蒙古族古典文学从民间文学强势很快过渡到书面叙事文学异常发展阶段的重要时期。蒙古族翻译文学就是在这种令人欣慰的民族文学裂变与复兴的大好环境下迅速发展起来，进一步拓宽自身发展道路的。

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和特定体裁的文学作品之类型化发展，是民族文学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就古典小说类型研究而言，我们既可以根据蒙古古典小说的文学形式特征，将13世纪至19世纪末的蒙古小说划分为诗体小说、散文体小说和散韵结合体小说这样三大类型或体系，又可以根据小说题材及其蕴涵的思想内容，把这一时期的蒙古小说划分为历史小说、神话小说和言情小说这三大类型或体系。事实证明，清代蒙古族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事业的发展，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古典小说形式与思想内容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回顾历史，自1644年起蒙古社会历史发生了悲剧性的重大变化。特别是清康熙三十年（1691年）多伦淖尔会盟之后，喀尔喀蒙古和东蒙古完全陷入清朝康熙皇帝的强权统治之下，蒙古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发展受到了征服者连续不断的军事征讨和巧妙的宗教愚弄政策的双重阻力。清朝统治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一方面利用藏传佛教，进一步从思想精神上征服以蒙古族、藏族、维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却大力发展了满、蒙、藏、维族文化。因此，由清廷直接组织编写、编译和校勘出版的《（御制）满蒙合璧文鉴》（即《二十一卷本辞典》）、《数理精仪丛书》（蒙古文书名为“吉如海因高勒”即《数理精蕴》）、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等一系列大型文化精品问世，客观上刺激了蒙古族历史文化发展，加速了蒙古族翻译事业的复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乌弥氏阿喇纳（？—1724，以下写作阿日那）、乌拉特固什·毕力贡达赖、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和

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图木等一大批天才的学者、翻译家、文学批评家脱颖而出，并热情参与广泛的民族文学交流活动，积极汲取印、藏、汉民族古典文学的宝贵养分，继承和发扬蒙古族书面文学创作传统。最突出的例子是，康熙六十年（1721年），乌弥氏阿日那成功地翻译《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附带回后批语），为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此之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优秀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普遍流传，对蒙古古代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的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考古证明，早在14世纪70年代蒙古地区就流传着一种附带精美插图的木刻本蒙文《唐僧取经故事》。^①这与新疆吐鲁番出土的14世纪的蒙古文《苏勒哈日乃传》（即《亚历山大传》）一样印证了元末蒙古文学的长足发展和繁荣。

后来，在16世纪末至清朝康熙年间，汉文《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也在蒙古族中广泛流传，甚至对蒙古古典文学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发展演变尤其是对蒙古古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过深刻影响。然而，在清朝统治者实行严酷的“文字狱”政策，屡屡禁毁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小说、戏剧作品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几乎没有人敢公开翻译或研究这些文化精品。难怪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在北京木刻出版的蒙古文长篇神话小说《十方圣主格斯尔可汗传》的编辑者或出版者都没有署名。

据文献记载，《三国志演义》是在顺治七年（1650年）被翻译成满文的。因为清朝统治者喜欢读《三国志演义》，便为了学习战阵之法和权谋之策而由朝廷组织满、蒙、汉民族的翻译家在很短的时间内翻译了《三国志演义》。这对精通满文的大批蒙古族读者提供了欣赏和研究《三国志演义》的良好机会。到了18世纪初，深谋大略的康熙皇帝为了从精神上彻底征服蒙古族，于1717年命谕北京净住寺大喇嘛乌拉特固什·毕力贡达赖、阿巴嘎·德木齐格、乾清门一等待卫拉锡等著名学者和翻译家，将佛教经典集成《甘珠尔》经再次校审，汇编成一百零八部，并于1720年木刻出版。朝廷命官、大翻译家乌弥氏阿日那是这项硕大宗教文化工程建设的主要人员之一。由于《西游记》是以唐僧取经故事为题材的具有扬佛抑道思想旨趣的长篇神话小说，与清朝统治者推崇佛教的治国政策并不冲

^① 参见1983~1984年间出土的额济纳旗黑城古文书资料，现收藏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中国和日本学者正在进行联合研究。

突，奉康熙皇帝之命赴新疆巴里坤地区驻防的乌弥氏阿日那于1721年把《西游记》翻译成了蒙古文。^①

尽管研究中国文学史以及《西游记》的论著大多认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1500—1582），但《西游记》的研究历史一再提醒人们，此说还不能成为定论。清代小说批评家张书绅曾经很客观地讲道：“《西游》一书，原是千古疑案，海内一大闷葫芦。但其为文，有据理直书者，有隐于寓者，亦有借音借字者，更有止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②可见《西游记》作者佚名，已成为难解之谜。

从《西游记》研究的历史看，世德堂本《西游记》向来被学术界视为《西游记》最早的版本。很可惜，此刊本未署作者名氏，而只提“华阳洞天主人校”。全书分二十卷一百回，卷首书有陈远之的《刊西游记序》，其中写道：“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曰：‘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余览其意近斯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夫不可没已。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万言（数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③因此，多数研究家认为，明刊世德堂本《西游记》也不是《西游记》的祖本。“华阳洞天主人”所校订《西游记》之底本乃是不署作者名氏的作品。可以相信，“华阳洞天主人”既是世本《西游记》的校订者，也极有可能是世本《西游记》的最后改定者。^④我们考虑到，由于历史的缘故，阿日那在翻译《西游记》之前或许没有弄明白《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然而事实说明，他深信这部伟大作品是以浪漫主义创作手段体现强烈的务实精神，艺术地揭露和批评封建社会各种矛盾和斗争的伟大神话小说，所以以惊人的毅力将一部八十万言巨制的《西游记》翻译成蒙古文，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翻译史上的奇迹。

说到阿日那翻译《西游记》，首先应该了解明版《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这是比世德堂本《西游记》（1592年）稍晚问世的明代唯一附带回后评

① 康熙末年，蒙古准噶尔汗国策旺阿喇布坦袭击哈密，进军西藏，成为清廷的主要对抗力量，于是康熙皇帝选派富宁安、阿日那等率兵驻防于新疆吐鲁番地区。

② 参见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87页。

③ 刘荫柏编：《西游记研究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55～556页。

④ 参见张锦池著：《西游记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语的《西游记》，也是在内容上与世德堂本《西游记》基本相同的刊本。该刊本共十册，一百回，不分卷，亦不题撰人名氏。李卓吾，即为明代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和思想家李贽（1527—1602），一名载贽，字宏甫，号卓吾、温陵居士等，福建晋江人。嘉靖时（1522~1566年）中举，曾任县学教谕、国子监博士、云南姚安知府。后弃官走讲学、著述之路，以“异端”自居，终被迫害，由万历皇帝批准逮捕，惨死狱中，以著名的《焚书》、《藏书》传世。但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他不是批评《西游记》的“李卓吾先生”。今传《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在国内发现比较晚，中国历史博物馆和河南省图书馆各藏一部，国外又见于日本内閣文库藏明泰昌、天启年间刊刻大字本和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明金陵大业堂重刊本（缺第一、第二两回）。据学者李时人考察，不同时期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有十一种^①，此书首有袁于令（1592年？1599年？—1674）所作《西游记·题辞》一篇，尾署曰“幔亭过客”，下镌“宾白”、“令昭”墨印二章。袁于令就是明代词曲作家袁幔亭，名晋，又名韞玉，字于令，号于鹄、箨庵、鳧公、吉衣主人、幔亭仙史、剑啸客主人，江苏吴县人，做过一任荆州知府，著有传奇《西楼记》、杂剧《双莺传》等。明代盛于斯在《休庵影语》中已经写道：“批点《西游记》、《水浒》，皆称李卓吾，其实叶文通笔也。”而现在关于叶氏是否为《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真正批评者之问题，学术界尚有争议。^②近世学者多依钱希言《戏瑕》所说，认为由叶昼（叶阳开）假托李贽之名而作。

毋庸赘言，《西游记》是一部使佛教、道教和儒教思想融合为一体的神奇小说。“唐僧取经故事”虽为构成《西游记》小说的主要题材，但《西游记》小说描述的重点却不是唐僧取经的历史，而是神猴孙悟空的英雄传奇。其中歌颂孙悟空的“异端”思想与战斗精神，否定妖魔鬼怪，讽刺揶揄神佛，以“天庭”、“人间”和“地狱”贯通的虚幻世界图景，影射明末社会现实，猛烈抨击了腐朽的封建朝廷及其社会制度。再说，多数研究者认为，《西游记》也像《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一样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品。在《西游记》形成、演变和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我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艺人、文人作家和翻译家都作出过卓越贡献。如元末明初著名剧

^① 参见李时人著：《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2页。

^② 参见李时人著：《西游记考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63页。

作家杨景贤创作的《西游记》杂剧，就是蒙古族对《西游记》形成和流传所作出的早期重要贡献。而18世纪初由阿日那翻译的蒙文《西游记》，为蒙古人进一步研究或传播《西游记》开辟了新径。此外，满文《西游记》（包括满文《后西游记》）、朝文《西游记》以及古彝文《西游记》的广泛流传，也证实了其他少数民族对《西游记》的热爱和在传播或研究《西游记》方面的积极贡献。

这里着重探讨阿日那及其翻译的蒙文《西游记》，就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阿日那的翻译动机进行分析研究。

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六月，富宁安奉命进攻乌鲁木齐等地。七月三日，散秩大臣阿日那领兵一千三百人，袭击了准噶尔境内的乌兰乌素地区。康熙五十七年和康熙五十八年，康熙皇帝曾谕令巴里坤和阿尔泰驻军，暂停袭击准噶尔。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西北两路清军与进藏大军遥相配合，再次向准噶尔进攻，阿日那率兵四千，进攻吐鲁番。康熙五十九年七月下旬，巴里坤清军完成了对准噶尔地区的战略性袭击，八月上旬，乌弥氏阿日那率军返回营地。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阿日那利用服役期间的闲暇（在巴里坤军营中）潜心研究《西游记》，并于康熙六十年元月起翻译了《西游记》。而这种自愿的文学翻译实践，深刻地影响了他暮年的思想情感，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对康熙朝世态人情的态度和对人生意义的认识。阿日那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们，他是从儒家逐渐向释家转变的。从家族史上看，阿日那祖孙三代人有功于清朝统治者，阿日那暮年受康熙皇帝重用，从文职升为武将，被派遣到西域以后思想意识上发生很大变化，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清朝统治者的忠实卫士逐渐转变成了具有一定叛逆精神的思想家和社会批评家。这在他翻译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回后批语里反映得尤为深刻。以往有些学者一直认为翻译《西游记》的阿日那曾经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参加过征讨蒙古准噶尔汗国噶尔丹的昭毛都战役。这是不符合史实的。据笔者考证，在清康熙朝至少有过三个与乌弥氏阿日那同名的蒙古族历史人物。当时也确实有个叫阿喇纳（阿日那）的军事人物跟随乌弥氏阿日那的父亲阿南达将军，投入昭毛都战役，追击过噶尔丹汗部队。但他是土默特部蒙古人，比察哈尔部乌弥氏阿日那年长。其他两位叫阿喇纳的人也不是《西游记》的蒙译者。这三人既未具备翻译《西游记》的实际能力和从事翻译工作的各种优越条件，也没有过赴新疆巴里坤地区服役的经历，应该说1721年的蒙译《西游记》与他们无涉。笔者认为，阿日那生前为了实

现佛教意义上的心灵“释厄”而翻译了《西游记》。这也跟他在几年前直接参与校勘、出版蒙古文大藏经《甘珠尔》^①的不寻常经历有关联。“李卓吾先生”批评道：“读《西游记》者，不知作者宗旨，定作戏论”“即如第一回，有无限妙处，若得其意，胜如罄翻一大藏了也。篇中云《释厄传》，见此书读之，可释厄也。若读了《西游》，厄仍不释，却不辜负了《西游记》么？”^②阿日那凭其实际经验深刻理解了这一点，并热心实践了“李卓吾先生”批评意见。阿日那把翻译《西游记》、阅读或缮写传播《西游记》看作是自己最神圣的义务，从而通过翻译向广大蒙古族读者全面介绍《西游记》的思想内容。我们还应该指出，阿日那翻译《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单纯的文艺取乐，而是为了巧借“李卓吾先生”之文学批评妙笔，艺术地反映出他对现实社会不满的情绪和对世态人生的重新评价。

大体上讲，阿日那删简翻译《西游记》时尽可能绕过《西游记》那些驳杂而充满矛盾的神魔故事情节，突出了这部浪漫主义小说所蕴涵的叛逆精神以及讽刺揶揄神佛和“昏庸皇帝”的语言艺术风格。他贯彻始终的删简翻译原则，就是要把《西游记》主要故事情节的翻译与回后评语的翻译密切结合起来。作为18世纪初的著名翻译家，他首先认识到，《西游记》塑造的最成功的艺术形象是神猴孙悟空，而不是唐僧，唐僧只是充当了孙悟空形象的陪衬角色。阿日那也非常清楚，当时流传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回后批语，兼有指点读者阅读《西游记》，称赞《西游记》文笔和抒发评论者思想感受的双重意义。也就是说，阿日那与“李卓吾先生”心心相契，文学批评观点基本一致，因而选择《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作为翻译底本，同时重点参考使用了世德堂本《西游记》。

20世纪70年代初发现的察哈尔蒙文《西游记》抄本^③证实，阿日那蒙译的《西游记》是附带回后批语的二十卷一百回删简翻译本。他不但科学地采纳了世德堂本《西游记》分作二十卷一百回的传统形式，而且特别推崇

① 1717年，北京净住寺大喇嘛乌拉特固什·毕力贡达赖、阿巴嘎·德木齐格、乾清门一等侍卫拉锡等学者和翻译家们，奉康熙皇帝命谕，将《甘珠尔》经再次校审后，汇编为一百零八函，于1720年木刻印刷，阿日那参加了校审工作。

②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齐鲁书社，1991年，第15页。

③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特藏部收藏的经卷式蒙文《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附有回后“批语”，部分残缺，因来自内蒙古察哈尔地区察干乌拉庙，我们一般称为察哈尔抄本蒙文《西游记》。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文学批评思想，精心翻译其中的大部分回后批语，把明代小说批评家的先进方法和技巧引入到蒙古族文学翻译实践里，同时有意识地修正了《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不分卷的缺点。他充分发挥文学再创作的天赋，呕心沥血翻译《西游记》，把这两种明版《西游记》的形式与思想艺术风格融合于一体，给广大蒙古族读者奉献了一部通俗易懂而富有蒙古古典文学语言艺术特色的新《西游记》。

诚然，在我国小说传道理论是由明代批评家们提出来的。《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回后评语直观而明晰地体现了汉文长篇神话小说《西游记》的传道功能和明代小说批评家的思想宗旨。“李卓吾先生”的《西游记》回后评语中贯彻着褒扬真、善、美，摈弃假、丑、恶的正直道德观，表现出了反对一切虚伪、矫饰，反对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具有了反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不盲目推崇孔、孟之道或佛教各流派思想的风格。《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具有独特的文艺欣赏价值和传播价值。这引起阿日那的高度重视，从而把翻译《西游记》及其回后评语当作了研究《西游记》思想内涵，学习汉族小说批评方法和技巧的重要手段。大体上讲，阿日那的蒙译《西游记》具有以下再创作特点：

首先，阿日那尊重历史事实，在蒙译《西游记》的后记里不妄提《西游记》的作者是谁，而只是客观地说明他自己是根据一部“汉文（汉人）‘苏都尔’（小说）”翻译为蒙古文的。^① 我们知道，自清初刊行汪象旭评本《西游证道书》（约刊于1663年）起，社会上流传起全真派道士邱处机（1148—1227）作《西游记》^②之说，然而阿日那没有被这种传闻所迷惑，亦未直接使用《西游证道书》之类的清刊本《西游记》，这也是能够解释阿日那蒙译《西游记》里为什么没有专门叙述“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的理由。阿日那推崇并用以翻译明版《西游记》，而不翻译清刊本《西游记》，或许有其他特殊原因，但目前无文献可稽，我们还不能作出进一步结论。

其次，阿日那蒙文《西游记》分作二十卷一百回，并且附有回后批语。

^① 历史上，蒙古族有过以梵文借词“苏都尔”（Sudur）泛称经卷、传记、小说的习惯，大概从17世纪起多用蒙古词语“图古吉”（turugi）来表示“小说”。

^② 邱长春曾应成吉思汗之诏，与弟子李志常等十余人从山东莱阳起程，历时四载（1221—1224年）抵达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北营盘里雪山谒见成吉思汗。李志常据此作《长春道人西游记》二卷，二万余字。

这说明阿日那是在深入研究权威性的明版《西游记》文学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前提下，创造性地翻译《西游记》，既弥补明版《西游记》或者不附带回后评语，或者分回而不分卷的缺陷，又迎合蒙古人喜欢读《西游记》的实际要求，成功地创作出了完全符合蒙古族古典小说发展演变规律的蒙文《西游记》。更重要的是，阿日那灵活翻译《西游记》，注重回后批语，在蒙古族翻译汉文长篇小说并附带批评短文方面开了先河。

另外，阿日那并不是地道的佛教信徒。他凭借自己多年翻译工作经验，灵活运用意译、直译、编译等多种传统翻译手法，有时候采取一种翻译手法，有时候也交叉运用两三种翻译手法，从整体上准确地把握《西游记》思想内容，通过巧妙的删简翻译，很客观地反映了《西游记》作者以及明代批评者的创作主旨和独特的语言艺术风格。这对蒙古族文学翻译、蒙古文学理论和蒙古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为了在较短时间内突击性翻译《西游记》，也为了照顾大多数蒙古族读者阅读长篇小说的能力和审美旨趣，阿日那大量删简了原著中可有可无的诗赋和明显重复的细节描述语言以及频繁出现的禅语、道说，重点翻译了原著几百首诗赋中的三十多首。这样大量删简诗赋，并没有使《西游记》各回故事情节线索中断，曲解其思想内容；与此相反，阿日那确实克服了《西游记》原文中因过多穿插赋文而影响读者阅读情致的弊端。作为蒙古族古代翻译家，他很清楚《西游记》的诗词分类很多，除了汉民族传统体裁的词赋以外，还有大量的以律诗、绝句、对子等构成的回末诗，如果机械而过多地翻译这些诗词，就有可能出现与蒙文《西游记》读者欣赏情趣相悖的倾向。

《西游记》的部分诗赋的确很难被翻译成符合蒙古族读者审美标准的诗作，但阿日那凭其语言天赋，将《西游记》中最重要的诗文都翻译得相当优美而准确。他在翻译中发现，《西游记》里有很多重复叙述的文字、段落，是拉长《西游记》故事情节线索的主要原因，于是恰如其分地删简了《西游记》中复述性描写文字和段落。据统计，阿日那删去不译的文字、段落的数量不少于删去不译的诗赋之总字数。例如，在第三十一回《猪八戒义激猴王，孙行者智降妖怪》中，舍去了猪八戒的一大段解释性言语，大约450个字。阿日那认为在前面已经叙述了猪八戒所讲的故事情节，因而没有必要重复翻译。不过为了保持前后故事情节描述的连贯性，阿日那还是以“那时八戒道：

成蒙古国通用的斯拉夫蒙古文，分作两册出版。这在蒙古国读者和蒙文《西游记》研究界产生了积极反响。1997年，学者扎拉嘎发表国内第一篇专门研究阿日那及其蒙译《西游记》的重要论文。他明确指出，阿日那蒙译《西游记》的回后“批语”，主要是译自明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的。而在过去，有不少学者忽略了版本学考证，没有充分考虑到察哈尔蒙文《西游记》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抄本，结果误认为“阿日那翻译《西游记》，并撰写过四十七则回后批语”。

根据笔者版本学考证，察哈尔抄本《西游记》的底本也不是阿日那于1721年翻译的《西游记》原本。从其他几种蒙文《西游记》抄本所包含的回后批语内容和数量上看，阿日那翻译的《西游记》回后批语不只是四十七则。他有可能翻译了《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九十五则回后“总评”“总批”“又批”中的六十八则以上。阿日那出于影射康熙朝日益尖锐化的各种社会矛盾和斗争，宣泄出自己坎坷人生的悲苦感受的需要，学习“李卓吾先生”，把《西游记》的社会功效比定为佛教的《大乘经》，从而把个人“释厄”的愿望和讽喻、批评现实社会的尝试都融入于蒙译《西游记》的回后批语之中。换言之，阿日那蒙译《西游记》回后批语，不仅使蒙译《西游记》的文学价值倍增，而且真实地反映了译者本人的文学批评思想。

深入了解《西游记》研究的历史以及当前学术界热烈争论的诸多问题，也是我们蒙文《西游记》研究的重点所在。而讨论《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和《西游记》杂剧对《西游记》神话小说形成的积极作用，进一步探讨18世纪蒙古族著名历史学家兼大翻译家乌珠穆沁公·衮布扎布、大喇嘛学者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和察哈尔格西·罗布桑楚勒图木等人在《西游记》研究和传播方面的实际贡献，对于大致描述18世纪至19世纪初蒙文《西游记》流传、演变的历史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19世纪初的卫拉特蒙古人罗布桑琮瑞喇嘛在研究和传播《西游记》方面也作出过突出贡献。根据现收藏于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特藏部的托忒蒙古文《西游记》抄本后记介绍，他是一位很有文学修养的喇嘛学者。1813年，他欣然接受新土尔扈忒盟盟长亲王利格齐（lig ci）道尔吉提议，把一部来源于蒙古东部地区的回鹘体蒙文经卷式抄本《西游记》改编成了四大卷托忒蒙古文《西游记》。现在仅存第三、第四两卷，前两卷下落不明。这是流传于新疆地区的一种传统的经卷式抄本，具有浓郁的西部蒙古